

第柒章 結論

一、冷戰後美日安保之強化

(一)美日安保強化背景

冷戰結束以後，以美蘇兩大集團對峙為主的國際體系結構迅速瓦解，國際政治格局進入美國獨強的時代中，對抗背景下的世界大戰危險逐漸被浮現的各類矛盾所取代，地區大國之間的競合關係則日益複雜。美國雖擁有世界最強國力與軍事力量，但原先冷戰指導典範(paradigm)已不再適用，¹ 東亞也因美蘇兩國駐東南亞軍隊撤離而呈現權力空隙，來自整個國際體系中的恐怖主義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威脅卻逐漸增加，不僅要應付各種對國際秩序及其利益的潛在威脅，還存在處理全球事務時「力不從心」等現實難題。

美國重視東亞雙邊軍事同盟，除冷戰時期維護其安全利益與共禦蘇聯情誼之外，主要還是基於區域內存在歷史、種族、宗教、文化等複雜的衝突因素，加以地區既缺乏有能力及能放心的安全主導國家，短期內又難建立類似歐洲北約般的集體安全機制。為因應地區內日益增加的共同挑戰，避免可能出現區域性強權影響其領導地位，美國認為必須尋求與各盟邦、友邦及臨時性盟友在內的各個國家加強合作。

冷戰結束之前，美日安保與美韓、美澳及美菲等其他雙邊安全體制的地位基本相當。冷戰結束後隨國際情勢演變及多種因素影響，美日兩國基於國家戰略目標與利益考量，特別是逐漸面對中共崛起與北韓發展核武等挑戰與壓力，促使認真思考提升安保效能發揮作用需求，加上領導人意識型態與作風契合，兩國政情發展與民意走向也支持相關作為，經漫長綿密的複雜歷程，逐步強化安保達今日水準，成為美國因應區域潛在威脅的最主要安全機制。日本則依附安保循「美主日從」模式爭取成為政軍大國，在美國全球戰略格局中的支撐地位也更加突出。

(二)美日安保強化歷程

1996年1月，屬日本「鷹派」的橋本政府上任，美日兩國在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機背景下，4月發表了《美日安保聯合宣言》，將二戰後簽訂的安保條約再行確認，同時為重新定義設定原則框架，確立雙方面向21世紀安保合作的基本方向，也意味著兩國終將走出當時的經濟摩擦陰霾。日本自此分擔美國東亞防務的態度轉趨積極，並開始承擔支援美軍任務；美國對日政策及美日關係也重回安全基軸，條約活動範圍則擴大至「亞太地區」。在顧慮中共反彈之下，日本政府對「周邊有事」定義也達成以事態發生性質而非地理判斷的概念。

1997年9月，美日於紐約發表新的《防衛合作指針》，將雙方合作範圍確定為「平時合作」、「日本受武力攻擊時的對應行動」及「周邊事態下的合作」等三種情況，具體列出15大項及40小項的雙邊軍事合作項目，美軍負擔維護日本周邊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日本則需在本土、公海及國際空域上提供美軍後勤支援。由於《指針》跨

¹ 〈美國柯林頓政府的朝鮮半島安全政策：從博富爾的「行動戰略」理論分析-PART4〉，2006年3月3日，http://www.wretch.cc/blog/JAILCAT&article_id=3846240。

出雙方建立實質軍事合作關係的首步，被視為冷戰結束之後美日安保關係之轉捩點，重要性則比擬為第三版的美日安保條約。

同年美中簽訂「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予人美中關係回溫而美日同盟沈寂之感，但日本逐漸明確的「借船出海」國家發展策略目標並未因柯林頓政府親中表現而動搖。1999年4至5月，日本國會通過《周邊事態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及《美日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等三項確保《防衛合作指針》順利執行的相關立法，也隱約將台灣納入美日安保範圍之內。至此，安保經《聯合宣言》發表、《指針》發佈及法案制訂等三階段重新定義過程遂告完成。依據新定義的安保架構，日本自衛隊對於因防衛日本周邊危機出兵的美軍須提供後勤支援；首相遇推斷其安全遭受威脅的「預測事態」，也可不需國會同意逕行召集內閣會議下令自衛隊出兵，用兵合法性與機動性大為提高。

2000年10月，俗稱「奈伊報告」的「美國與日本—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報告發佈，建議美國將《防衛合作指針》視為擴大日本在泛太平洋同盟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基礎，倡議將同盟「普通化」，即兩國除分擔責任之外，更應分享權力；鼓勵日本行使自衛權並提出七項必要的措施。由於「報告」核心意見為新任總統小布希所採納，9.11事件更使美國認真檢討全球安全與戰力精進調整部署問題，安保體制遂朝向強化的方向發展。

2001年，日本為配合反恐運作，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自衛隊修正法案》及《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等所謂的「反恐三法案」。2004年11月，日本發佈新《防衛計畫大綱》，將海外派兵與本土防衛並列為自衛隊基本任務，據此調整兵力部署及增加軍備，建構日本新防衛力量的積極性國防政策；《大綱》並提出「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存在非常不透明與不確定因素」，首次表明中共對日本構成威脅，透露出其對區域安全挑戰的關注及防範意圖。

美軍於9.11事件後加速推動轉型(transformation)調整全球戰略部署。駐日美軍調整部分共與日本進行三次正式的「2+2」會議磋商，從確認共同戰略目標，到明確美軍與日本自衛隊角色、任務及能力，最後全般檢討確認駐日美軍戰力結構，完成美日安保最大幅度且實質性的強化。

第一次會議於2005年2月召開，除將台海問題列為兩國共同戰略目標之外，並將同盟防衛範圍由過去的日本擴大到亞太與全球範圍，同時有意藉安保對台海進行戰略管理。次月中共不顧輿論反應仍通過醞釀多時的「反分裂國家法」，日本在嚴重憂慮之下，於4月底發表「美日安保對象包括台灣」言論，當時還因此引燃大陸抗議及抵制日本怒潮。

同年10月兩國再度召開會議公佈「美日同盟轉型與整編計畫」，就雙方角色與任務分擔發表期中報告，重新調整駐日美軍角色，並將其亞太陸海空三軍海外指揮中樞集結日本。至此美日安保原保護日本及維護亞太安全宗旨轉向兩國全面性戰略聯盟，此一植基於日本「反恐三法案」的新戰略聯盟賦予自衛隊得不經聯合國同意參與全球性任務的權利，同時意味著日本軍備將逐漸提升至美軍水準。

2006年5月，美日「2+2」會議完成「駐日美軍兵力調整最終報告」，確認駐日美軍及自衛隊重新部署日程與計畫，包括駐日美軍兵力調整、駐地整併、設施歸還等，預定2014年全面完成部署。協商完成之後，美日同盟關係與美軍戰略部署重新獲得定位與調

整，象徵雙方安全合作關係已從過去日本的依附與依賴，朝向美日相互合作與支持，共謀地區和平穩定與主導權的全面夥伴關係演進。

二、安保未來走向與因素

美日安保未來發展令外界關注，本文觀察的影響因素包括：美國政策與世界領導權的變化，特別是國際支持度及陷於伊拉克等困境後的美國國力與影響力有無改變；美日及美日中關係走向；以及日本外交軍事等政策及產生效應等。

(一)美國支持度與國力變化

安保條約長久以來鞏固了美國的亞太軍事存在，加上提供核子保護傘，使其推動與維護包括防止核武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國際安全秩序時，能獲得區域國家的信任與協助，對美關係也被置於外交主要地位；至少認為美國作法係維護世界和平秩序所需，保持亞太存在與軍事絕對優勢有其必要，且對美國影響力仍最熟悉可靠，一旦其勢力淡出東亞，不確定性將太大，狀況也可能不如目前，此種依賴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轉化成為對其東亞戰略包括安保體制的支持。

然而 9.11 事件之後，小布希政府「先發制人」及「政權更替」等進攻性現實主義思維作法逐漸與國際秩序及安理會職權發生衝突，加以伊戰問題遭致爭議指責，顯示美國軍事解決問題手段很可能破壞聯合國和平機制及將世界帶到險境，使原本普遍的同情與支持增加了質疑。

奈伊所著《軟實力》書中引用蓋洛普(Gallup)機構針對 24 國所做民調顯示，有 15 個國家超過半數受訪者由於美國外交政策而對美國反感；歐盟民調 (Eurobarometer)也得出大多數歐洲人認為美國在包括維持世界和平等議題上經常扮演負面角色的調查結果；普優民調(Pew poll)所詢 42 個國家受訪者中，亦有 20 個國家過半數受訪者對美國有無「考量到你的利益」問題回答「不太多」或「根本沒有」。² 此說明美國在 9.11 事件後，或因恐懼感及悲憤心理交織激化的單邊主義作為，已導致其國際形象受損甚至反美情緒升高，不利其領導國際事務及地位。

奈伊將美國不重視軟實力導致國力衰退的大部分原因歸咎於外交政策。曾任柯林頓時期亞太安全副助理國防部長的坎伯(Kurt Campbell)就於 2007 年 2 月批評美國外交政策不應如五歲小孩踢足球般的忽略整體佈局；³ 另根據美國 2007 年 3 至 4 月所作最新民調顯示，有 84%的受訪民眾對政府目前處理世界事務方式表示憂心；68%認為世界以負面眼光看美國；66%民眾認為政府處理外交問題時屢屢出錯；67%則認為美國與世界關係正走在錯誤軌道上；另有 73%的受訪民眾認為美國未作好帶領國際創造更和平繁榮世界的角色；甚至有 82%的受訪者認為世界對美國變得越來越危險。⁴ 顯示就連美國人民也逐漸失去對小布希政府處理國際事務能力的信心。安保強化正屬於小布希任內重大的外交作為之一。

²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127-128.

³ 〈阿米塔吉報告：穩定東亞 美日中應成鐵三角〉，《聯合報》，2007 年 2 月 18 日，第 7 版。

⁴ 〈八成四美民眾 憂美處理世界事務方式〉，《大紀元》，2007 年 4 月 4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7/4/4/n1668020.htm>〉。

當愈來愈多人及國家反映出「美國當今外交政策有可能不當」時，即意味著今後美國在推動包括亞太在內的全球戰略時，可能遭遇更多來自各國的阻力。此等壓力若持續增加，美國以優勢軍力威嚇為主的策略恐受更多限制而更難發揮。事實上美國實力也存在衰退隱憂，除經濟上的預算及貿易雙赤字偏高、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隱憂等問題之外，即便外交也有「鴿派」與「鷹派」為東北亞戰略及北韓問題路線爭論不休。⁵ 小布希總統任期最後「跛腳」效應應在所難免，繼任者還可能要為若干外交困境收拾殘局，維持霸權將更顯得力不從心。

(二)美國外交政策走向

美國單邊主義政策負面效應已逐漸浮現，促使美國必須認真檢討安保強化後的利弊得失，以更務實態度面對中共崛起及北韓擁核現實。今後如何將伊拉克問題善了重塑其國際形象與信心，已成為美國短期內影響外交作為的重大因素。坎伯就提出美國若於未來兩年持續在伊拉克方面失利，政府高層將無暇顧及亞洲的警語。⁶ 道出了美國政府及其東亞戰略的最大挑戰。

安保強化遏制中共與北韓持續壯大等功能未能發揮，對美國而言的實質功能似乎只有為其主宰區域所需政治、文化及經濟影響力提供足夠的軍事後盾，同時鞏固與日本等盟國戰略聯繫。由於未來反恐情勢可能惡化，美國或將繼續陷於伊境及反恐困境中，在當前拉攏印度成果有限，俄羅斯又已逐漸展露謀求多格局權力均衡的復甦態勢下，美國向日本以外國家尋求更廣泛妥協合作、包括爭取中共對重大國際事務支持與協助分擔責任及穩定亞太情勢等現實壓力將更加沈重。

從現實面來看，當今東亞已呈現日中兩國競爭區域主導權態勢，美日強化緊密同盟關係之後，日本不僅已具美國所望制衡中共作用，未來依賴美國安全保護及支持其國家發展的政策主軸也不易改變，美國看來似乎有更多不必再將重心置於日本的理由，包括之前不顧日本人質問題立場對北韓態度軟化及在兩岸等議題上與中共合作之傾向，都顯現有此種考量的意味。在小布希卸任後單邊主義有可能趨緩、中共崛起及國際事務合作重要性日增、北韓擁核問題難解；加上俄羅斯拜能源獲益之賜加速復甦、以及在中俄之間新的平衡者角色重要性逐漸浮現之下，未來美國有可能朝向以美中關係為核心的新東北亞安全模式微調，屆時區域國家可能必須面對如何在美日同盟基礎上既有的東北亞安全體系及新美中關係核心模式之間，重新調整維持最有利型態的難題。

不論如何，由於美日關係仍為維繫兩國亞太地區地位權力的最主要架構，且日本可以民意乃至中共牌籌碼動搖美國亞太區域掌控及本土安全防衛(例如拒絕防禦攻擊美國本土之飛彈)，以因應美國態度的轉向，因此美國仍會重視日本的亞洲影響力及作用，使其繼續擔任能充分支持美國遂行地區戰略及主導權的「代理人」角色，同時讓日中保持競爭平衡，維持美國東亞制高點的「協調者」與「仲裁者」姿態。

(三)日本外交與軍事動向

⁵ 胡聲平，〈從布希就職演說看美國外交政策走向與限制〉，《歐亞通訊》，第8卷3期，2005年3月，頁2。

⁶ 胡聲平，前揭文。

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存在可視為大規模右傾趨勢的「正常國家」期望，領導者順應潮流結合個人路線與特質，產生依附安保的「藉船出海」思維，為強化同盟政策提供了動能。然而該傾向多屬理性溫和的理念認同而非普遍性的激情，也非大多數日本人的絕對優先，領導人若過於偏執以致背離民意主流疏於經濟民生，社會支持基礎與執政能力就會弱化，進而影響國家發展甚至安保等重大政策的推動。

安倍晉三擔任日本首相之後，繼前任小泉外交步伐，仍將與美國緊密關係視為外交政策的主要重心，且上任後即大動作強調愛國主義與修憲議題，頗有欲加速日本政軍發展之態勢；然其執政聲望卻不升反降且仍持續下滑，反映出日本多數民眾寧願重視更實際的民生與福利問題，對敏感度高的政治議題則仍持審慎心態。此將使安倍執政團隊遭到的黨內壓力增加，反對黨力量也將乘機坐大，進而衝擊其執政權與能力，對甫強勢推動的修憲工程及過去對美國「一面倒」政策下安保強化等外交路線主軸憑添新的變數。

對日本而言，不論安保條約如何強化，「美日安保」似乎仍存在些許二戰侵略與戰敗國的陰影；靠美國約束及提供安全保護的內涵；以及受非戰憲法制約只能實施「專守防衛」等不利其正常國家的負面表徵。正如其修改歷史教科書期擺脫歷史包袱的心態一樣，日本近年來不斷強調「新同盟」角色，似乎有意以「世界中的美日同盟」取代具傳統被動與消極意涵的美日安保體制的新包裝，營造出將與美國共同參與及主宰區域事務、令人耳目一新的角色與聲勢。問題是美國是否看出日本意圖且願意配合。

日本依靠美國進一步壯大及避免戰後在亞洲被孤立，卻因未重視與中共南韓等亞洲鄰國維持良好關係而嚐到苦頭，申請入常案就遭兩國抵制，且美日之間也並非沒有矛盾，例如提過的美軍駐防經費分攤與基地居民反彈問題、美國漠視日本六方會談立場陷其於孤立、以及臨時改變入常案支持任其受挫等心結。日本對中共關係則有經濟互賴、日本進入常任理事國案爭取支持需要及中共樂見日美關係疏離等因素支撐，未來日本對美關係判難像過去般熱切平順，兩國維持「世界同盟」熱度的動能很有可能降低。

三、安保強化下的省思

(一)安保非東亞和平萬靈丹

中共經濟與軍事力量大增及北韓擁核，即使不能全然視為立即威脅，至少也可能造成地區國家不安，是以過去美國認為中共應受到遏制，至少應對其保持懷疑與戒心，因而期望其周邊存在嚇阻或遏制力量，⁷但中共已懂得仿效美國藉全球化獲得軍事、科技、經濟、政治等各領域利益的經驗發展國力，並將傳統零合強權政治轉變為雙贏競爭，⁸既不挑戰美國唯一強權地位，還持續拋出和平橄欖枝以化解外界威脅感，試圖建立健全持衡的美中雙邊關係，營造更多合作空間以減少崛起阻力，同時發揮制約及影響美國抑中戰略的效果。北韓則繼續以擁核作為生存及獲取國際空間籌碼。美日除非動武解決

⁷ 李明，〈美日東亞戰略下的台灣軍購〉，民 94 年 9 月，〈http://www3.nccu.edu.tw/~minglee/arms_deal.doc〉。

⁸ Yong Deng and Thomas G. Moore, "China Views Globalization: Toward a New Great-Power Politic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7, no.3(Summer 2004), P.134.

或繼續加大恫嚇力度到確定能讓對方放棄或低頭，否則就只能在維持對峙與讓步妥協當中作出選擇。

美國對伊拉克動武的理由是其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威脅」，事後卻證明情報不實甚至蓄意誤導世人。伊戰本身也由美國領導的正義之戰變成難以彌補的重大錯誤；美國也是藉中共與北韓「威脅」大幅強化安保鞏固亞太優勢地位，還藉伊朗試圖製造核武「威脅」訴諸制裁及威嚇動武，達到抑制其發展及凝聚親美力量強化世界秩序維護的主宰地位，這些日後或許有可能亦被逐一印證係美國同樣手法下的不必要甚至錯誤作為也說不定。

安保體制強化使美日在國際之間更能發揮軍事與政治優勢，但此等被認為不一定非靠軍事擴張或威嚇手段達成。冷戰後世界已邁入延續和平發展的 21 世紀當中，由於安保發展會牽動區域國家特別是中共反應與地區情勢變化，不論美日安保主要目的是遏制戰爭或權力競爭，美國既居超強地位，也以標榜民主道德等價值觀的世界秩序維護主宰者自許，在推動國際事務時，若能調整一味追求軍事優勢的迷思，重視相關國家感受與正負面影響，採取以外交思維與途徑為主的方式處理區域問題，爭取區域國家更多認同與合作，使安保體制正面效益充分發揮，負面作用儘量降低，當能避免予人霸權思維及單邊主義下主觀偏差等質疑，共同維護各國所望的穩定與和平，對世界秩序作出最大貢獻，才是區域長治久安之道，也是美國身為自由世界領袖應有的責任。奈伊就指出美國若能讓其他國家認同美國的存在係其安全保障根源，自然願意將願景導向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⁹ 或許正是對美日安保未來調整與精進方向的諍言。

當今情勢下武力威嚇的效用既存在極大盲點，軍備競賽又會增加對立與更多相互毀滅機會，美國保持維護世界秩序所需優勢地位，若能低調進行並努力促成共同裁軍或外交解決問題時的籌碼而非主體，於真正必要時始亮底牌消弭戰爭威脅，當可減少其濫用軍力作勢恫嚇或用作平時獲取利益手段的爭議，方為確保世界長久和平之道。日本若想成為真正東亞大國，可以更多誠意融入亞洲增進信心友誼，降低各國歷史情結下的猜疑及被炒作的空間，以期達成所望正常國家目標而非爭議下的軍事大國。

(二)台灣對安保不宜過度期待

「美日安保能遏制中共進犯台灣」似乎普遍為一般人所認知，然而實際狀況並非如簡單字義上的單純。

首先是美日中之間存有極深厚的利益關係，任何兩方交惡不僅不利於彼此，更將影響第三方利益。幾乎可以推斷除非美日戰略上皆有與中共作戰的絕對利益需求與必要性，且有迅速瓦解中共戰鬥意志獲得勝利及控管損害的把握，否則即缺乏交戰的理由。況且美日只要施壓台灣遵守承諾，即可不必安保動武。台灣在對外無能力抗拒美日等國、內部又缺乏共識與對抗決心的狀況下，並無任何一意孤行的條件，否則即等於站在安保對立面、甚至演變為與美日中三方為「敵」的不智局面。

美國即使真準備好與中共作戰，在其東亞戰略核心遂行須藉助、或至少勢必波及日本之下，也須事先獲得日本充分支持與參戰決心。但對於日本而言，台海地區不是遙遠的中東而係其周邊，中共更非不堪一擊且無核的阿富汗或伊拉克，地區內任何軍事行動

⁹ Joseph S. Nye, Jr., op. cit., P134.

都將立即影響其安全發展及利益所繫的穩定環境，直接介入戰端損害更難估計，因此理應避之唯恐不及，遑論還會為非本國的台灣介入與強國中共翻臉或交戰情境。

事實上美日同盟雖以因應威脅存在及強化，但依本文之前分析及檢視冷戰後東亞環境，並無國家具備對美日動武、或能加諸重大且立即危害之意圖或條件，否則兩國歷來對安保態度也不會有冷熱不同等起伏變化，日本重視安保真正所圖的應該還是國家發展。既然如此，一旦情勢「意外」演變成真的面臨捲入重大危害的戰火情況，日本並非沒有拒絕履約、或技巧性推託延遲、甚至領導人陷入不知所措難下決心，最終還是由我單獨苦戰禦敵的可能性。

另外，即使符合安保體制應啟動運作的緊急事態，啟動與否及其過程與作為，也受安保條約及兩國相關協定以外因素的層層制約。就以國內因素為看，美國政府 2007 年在其國內外龐大反對壓力下仍不斷對伊國增兵期能獲得決定性進展，日本此時理應依據同盟精神更加協同配合才對，但其政府卻仍不得不屈服於國內強大撤軍壓力大幅縮減了海外反恐任務規模，甚至還可能須面對年底《反恐特別措施法》效期屆滿國會是否同意延長的難題；這當中自然還夾雜了許多政治利益的現實算計。此點涵意非常重要，因為安保是否及如何介入台海戰爭，同樣會受類此兩國現實、複雜而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不論安保如何強化，美日兩國領導人在最後付諸行動前，勢必要經歷層層制約及考量，且愈攸關兩國本身的安全與利益，受影響程度與變數就愈大。

未來安保體制如何及能否有效因應東亞各種變局，特別是美日解決台海武力危機的態度作法，恐怕連當事的美日兩國，也要等實際狀況發生、演進，經兩國連續縝密評估，連外交協商、恫嚇都無效、必須且已真正完成備戰隨時可強行介入的行動開始直前，才有確切答案。這也應該是美國長期以來對台立場及台灣關係法衛台精神始終維持「戰略模糊」的現實考量原因。

事實上中共動武僅從動機與規模來看，就有只是威嚇我政府放棄台獨的「教訓式」局部打擊或突擊；或是趁機全面攻佔台灣完成統一的「解放戰爭」之不同，過程、損害與影響及美日介入考量也有天壤之別。目前看來兩岸開戰多會是台灣不顧美日利益及勸阻下的「挑釁」行為所引起，美日即使不馳援也不會有太多責難，若再獲中共「限定戰火於台灣本島、目標為速勝、目的使放棄台獨、將確保美日利益安全」等相關承諾，最後選擇坐壁上觀或刻意拖延置身事外的可能性並不低。因此，吾人在瞭解美日安保發展與此等內涵之後，實不必對其存有過多主觀上的期待。

(三)兩岸共榮始為和平關鍵

美日過去判斷東亞威脅程度及應處時，忽略威懾盲點與其他因素作用，導致安保效果不明卻升高地區無謂的對立，如今不得不面臨檢討；中共長期以來同樣也以必須遏制台獨為由大幅建軍，包括於當面部署飛彈等非友善方式對台威懾，不僅忽視兩岸對和平有共同期待，也低估了台灣政府的理性與人民智慧。台灣長期在其武力脅迫與打壓之下，雖不能也無意如中共及北韓不畏美日威懾般加強軍事抗衡，但會加深對立反彈則無不同，亦不利於兩岸良性互動及長遠和平，中共也終將如美日一般難藉武力壓制而獲利。

中共經濟未來很可能仍維持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度成長，且國民生產總值(GDP)即將於 2007 年年底超越德國成為僅次於美日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未來若能在經濟發

展之後，逐步朝向政治民主改革方向努力，建立讓美日等自由世界更安心的決策制度與國防透明度，同時展現更多承擔國際責任的決心，當能降低美日以安保遏制及列強競相軍備競賽的動因，也能為兩岸和平雙贏開創更多契機。

對台灣而言，北韓挑釁的「戰爭邊緣策略」適提供美日強化安保及對其施加更大軍事壓力的理由，但北韓最後或可藉成功發展核武為其爭取更多戰略籌碼與安全保障。台灣需靠美國保護，且國情民意與政治體制不同，復有國際地位遭中共打壓孤立等因素限制，無北韓放手一搏的條件與空間，因此「維持台海現狀」幾乎是目前最能保障安全且各方亦能接受的方案。現實上既係如此，宜避免再操弄統獨議題徒增中共擴軍及對台施加更大威嚇的藉口，否則不僅不利於台海穩定，也將因更依賴美國而陷入美中或美日中主導權競局的框架中，喪失更多主權與利益自主性，國家內外環境也將處於不利經濟發展的持續對立與不安氣氛當中。政府多年來無謂的衝撞虛耗所得與台灣在國際與兩岸間國力消長情形對照，即已清楚說明一切。

台灣既無法擺脫美日甚至中共等國際環境因素制約，也難對以現實及利益而非道義為本質的美日安保等和平機制抱過於樂觀的期待，但卻依舊具有美日或中共在某種程度上欲拉攏我藉以「制衡」或「反制衡」對方、甚或「不希望台灣製造難題」等利基，例如對中共有「能給台灣何利益或保障，使不想搞台獨、或樂意支持統一」等策略操作空間。未來在美中及美日中競局中，如何擴大並善用該等利基，對內凝聚向心與共識，對外發揮更靈活務實的政經與外交手腕，建立國際社會中「共榮的伙伴」而非「麻煩製造者」的形象與功能，追求更實際且至要的全民福祉與國力發展，藉以累積更多兩岸及國際間運作的籌碼，營造長久的和平與穩定，才是處於當今美日安保強化下東亞情勢中之我國更應省思的課題。